

正说中国历代开国皇帝

安邦治国之鉴

解力夫 编著

开国皇帝多为富于开拓精神的创业英雄。他们的不同经历、不同执政理念，证明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至理名言。

新华出版社



正说中国历代开国皇帝

安邦治国之鉴

解力夫 编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说中国历代开国皇帝 /解力夫编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11—8678—5

I. 正… II. 解… III. 皇帝—列传—中国 IV. 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9610 号

正说中国历代开国皇帝

责任编辑：吕仙挺 张宏辉

封面设计：伍民力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a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75

字 数：29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678—5

定 价：33.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312) 89201322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代前言)

继新华出版社推出《正说中国历代末帝》之后，作为它的姊妹篇《正说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也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一般说来，历代末帝多是腐败无能的亡国之君，而历代开国皇帝，多是富于开拓精神的创业英雄。从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执政理念和不同的结局中，进一步向我们印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至理名言。

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历史规律，提供历史经验，启发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鉴古而知今，人类总是从过去了解今天，进而开拓未来。“以史为鉴”通常都是正面积极地告诫人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把握自己，大到治理国家，小到自我修养。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至今也有 2000 多年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明而又富于开拓精神的皇帝。其中嬴政秦始皇就是一位，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矛盾人物，既有大功也有大过。他最大的功绩是用 10 多年的时间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国时代（公元前 403 年—公元前 221 年）180 多年的混乱纷争的局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并相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统一全国文字，统一度量衡，大力发展水陆交通，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暴君，“焚书坑儒”、修筑长城，加上晚年贪图享受，特别是他的继承人秦二世胡亥，昏庸无能，在位期间滥用民力，继续大修阿房宫和驰道，人民不堪重负，随即爆发农民起义。秦朝相传两代，仅仅 15 年就被人民推翻了。可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最短命的王朝。

无独有偶，与秦朝情况相似的还有中国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也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成就卓著的皇帝。他于公元 589 年统一全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 300 多年的分裂局面。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加强中央集权，改

革官制，开始用考试选拔人才，推行均田制，鼓励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减轻租赋徭役，免除盐、酒税，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人民的生活也获得了显著的改善。但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继位后，却大肆挥霍奢侈，大兴土木，建都城、辟驰道、筑长城，驱使数百万人从事劳役。更为严重的是，在公元 611—614 年，三次入侵高丽，耗资甚巨；又常年携大批文武官员、妃嫔歌伎等，四处巡游，任情挥霍，征敛苛重，以致民怨四起，终于在公元 618 年，也就是在位的第 14 年，就被人民推翻了。其教训发人深省，即为君不为群众办事，大逆不道，不顾人民死活，必然走到绝路！

从秦朝到清朝 2000 多年间，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了三个黄金时代：

第一个黄金时代，史称“文景之治”，包括汉武帝刘彻的开拓疆域。从文帝开始到武帝末年，共 94 年，之后逐渐衰败，最后是王莽专权和称帝。

第二个黄金时代，史称“贞观之治”，直到“开元之治”，共 114 年，如果算到“安史之乱”则 129 年。之后，唐朝进入衰败期，直至灭亡。

第三个黄金时代是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 133 年。之后，就是内忧外患频仍，虽然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但也未能中兴起来，末期的“戊戌变法”也遭到失败，最后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

中国历史上的这三个黄金时代，以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唐代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最强盛而又文采斑斓的时代。唐代不仅经济发达，综合国力居世界首位，经济总产值占世界 1/3 以上，而且文化之繁荣也是世界公认的。唐代共产生了 2000 多位各具风格的诗人，留下了 5 万多首诗歌。李白、杜甫更是整个古代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创造出古代散文的典范精品。在小说、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方面，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涌现出许多具有很高造诣的文学艺术大师。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对外奉行开放政策。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当时唐朝的首都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里住有众多的外国使节、商人和留学生。唐文化依据本身发展的需要，对于外来文化有选择地



加以取舍，经过汲取和发扬愈显得丰富多彩。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各国也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斟酌吸收，使本国文化得以获取助益，加速发展。唐代确是中外文化交流极盛的时代。

辉煌灿烂的唐文化，深为当时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各国人士不顾跋涉的艰难，来到中国，观摩摄取。前来长安的使者络绎不绝，不仅有亚洲周边国家，而且还有中东、非洲，甚至欧洲国家的代表。文化交流的盛况前所未有。

据史书记载，日本前后任命“遣唐使”共有 19 次之多。日本的遣唐使不同于一般单纯于政治目的的使节，而是有意识地前来观摩唐朝的中国文化。遣唐使官一般是选择资深的通达经史的文臣，使团人员中包括医师、画家、音乐家，并有众多的学问僧和留学生同行。一次来长安的遣唐使团，多达几百人。从唐中宗到唐玄宗时代的几次，都在 500 人左右。日本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因而唐代的文化制度也随之介绍到日本。

在长安的外国僧人中，日本僧侣为数最多。每次遣唐使都有求法僧或学问僧同来，留中国时间久者，往往长达 20 余年，甚至达 40 余年。其中影响较大者，如唐高宗时智通、智达法师，随遣唐使来长安，从玄奘法相，归国后为日本法相宗创始人。荣叡和普照法师在开元时随遣唐使来中国，先后在洛阳、长安学法。荣叡和普照对日本佛学的影响虽然不大，但他们邀请扬州龙兴寺高僧鉴真去日本，对中日的文化交流却作出了重大贡献。鉴真带去天台宗经典和密宗佛像，在日本讲授戒律，并与随从僧人一起，依唐寺院样式建唐招提寺。中国的建筑、雕塑术和汉文学、药物学，都因鉴真之东行而传播于日本。日法师圆仁先后在中国 10 年，游历诸地，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也是一部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贵历史文献。

唐朝的繁荣昌盛，与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是密不可分的。李世民可谓中国封建社会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一代英明的君主。早在贞观二年（公元 628 年），李世民就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见《贞观政要》务农篇）这段话简要地揭示了他的“民为邦本”的思想。

“民为邦本”原是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也是历来所谓“治国大义”。不少帝王在口头上或者官样文书上也这样叫喊过，但像唐太宗那样切实地加以推行的却是寥寥无几。他鉴于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把“存百姓”当做



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联系。他的思想逻辑可归结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是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而百姓的存亡又取决于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欲。他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取决于君贤。他的一句名言是：“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从“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出发，必然引申出“农本论”的经济思想。“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人离不开衣食，“营衣食”就是要搞农业。唐太宗从隋末统治者践踏农本的惨痛教训中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就必须把恢复与发展小农经济提到国本的高度，制定了“抚民以静”的方针。以各种各样的经济措施，如实行均田，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兴修水利等等，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唐太宗在《金镜》这篇诏文中说：“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决心不做殷纣之类的“劳民之君”，而要做“治国之主”。因此，唐太宗能切实地推行重农政策，终于取得了“贞观之治”的成就。

唐太宗在事业上的成功，和他善于用人“虚心纳谏”是分不开的。他和魏徵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魏徵（公元 580—643 年）唐初大臣，政治家，河北馆陶人。少时孤贫落拓，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李密败后降唐，初任太子洗马，成为李建成的心腹，曾献过早除秦王（李世民）的秘策。玄武门之变，魏徵成为阶下囚。唐太宗慕其出众的才华，不报私怨，出于公心，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反而对其日见亲重，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不到 7 年时间，魏徵由仇虏而位及重臣。如此落落大度，在封建帝王中是极为罕见的。

魏徵也不负太宗的厚望，频加忠谏，劝君从善，不许为非，治国才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魏徵在职期间，先后向李世民陈谏 200 余事，反复以隋王朝为鉴戒，提醒唐太宗，强调：“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要求国君（李世民）居安思危，兼听纳谏，轻徭薄赋，躬行俭约，务必使人民得到安定，休养生息。他敢于不断对太宗犯颜直谏，对李世民的行动及政策措施给以极有益的影响。魏徵死后，唐太宗曾慨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歿，朕失一镜矣！”



现在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黄金时代之后就是衰败，或大乱，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从整个中国历史看，黄金时代少，而且较为短暂，动乱时代则较多，而且时间长，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从国际经验看，有人提出“70年现象问题”，指出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早译名为革命组织党），从1928年执政以来，长期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曾被世人誉为北大西洋的民主模式。然而，执政70年后失去政权。苏共执政72年后解散，苏联也随之解体。中国国民党连续执政几十年后也失去政权。上述三党失去政权各有自己的具体原因，但是严重脱离群众，不能正确地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内部腐化堕落等等，似乎是共同的。还是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一文中提出的论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人也。”就是说，统治阶级自己打倒了自己。

如何跳出“兴衰的历史周期圈”，这是所有的政治家和革命政党普遍关心的问题。早在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就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问题。他说：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都受这一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怪圈。当时，毛泽东同志回答说，已经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据薄一波同志说，1949年我军接管北平时，傅作义将军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他说，国民党执政3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共产党执政30年、40年后会不会也腐化？（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157页）可见，这个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是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任何执政党都要遇到或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2000多年来，许多开国皇帝和末帝兴衰的经验教训，和世界各国政党成功和失败的经历，进一步向我们说明：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如果放松自我约束，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和社会矛盾，放弃或放松民主监督，不注意自我改造，生活腐败，不注意听取群众的呼声，接纳正确的意见，就会官逼民反，就会被人民所抛弃。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接受批评，接受监督，能防止错误发生。但唐太宗有时也很难接受批评，忠言逆耳，甚至想杀这个田舍翁。只愿做自己说了算的统治者，不愿有人监督他。但绝大部分意见李世民还是听进去了，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和实施方略，这就是英明君主与昏聩君主的区别所在。

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执政党政府除了做好国内的事情外，对外还必须奉行与时俱进的积极开放政策，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吸取和采纳外国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为发展我国经济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所用。如果采取妄自尊大的封闭政策，势必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在这方面大清王朝有着惨痛的教训。

众所周知，大清王朝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创造过“康熙、雍正、乾隆黄金时代”。鸦片战争前，特别是1820年以前，一直保持着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35%，国民经济总产值占世界的32.9%。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18世纪后半期，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对中国来说，这同样是一次历史机遇，但清王朝却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由于政治腐败，思想僵化，科学停滞，才导致一次次错失重大历史机遇。英国人用鸦片和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一个丧权辱国的时代开始了。

中国自秦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告诫我们，历朝历代，盛世隐忧，君臣陶醉在歌舞升平中，没有意识到隐患，纪纲为之不振，贪污腐败，最后导致灭亡，这几乎成为普遍的规律。

同样，中国历史的经验和当代各国政党执政的经验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必须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生产，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提升我们的综合国力；必须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努力学习和吸取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必须居安思危，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必须廉政为民，严防腐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党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长盛不衰，才能使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春常在，永远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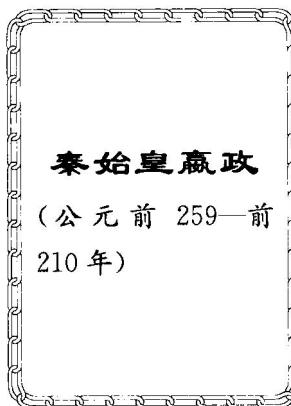
《正说中国历代开国皇帝》，是应新华出版社之约而撰写的。在写作过程中，曾参阅了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和从秦至清2000多年各个朝代的历代史及重要文献。由于书目繁多，不再一一列举。在写作过程中，承蒙诸多朋友的帮助，对此特表示诚挚的谢意。

解力夫

2008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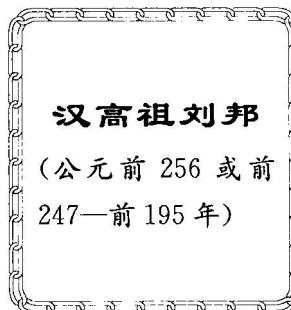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代前言) 解力夫(1)



秦始皇嬴政

(公元前 259—前
210 年)

秦始皇嬴政	(1)
嬴政生活的战国时代	(2)
商鞅变法 富国强兵	(4)
秦始皇亲理朝政	(7)
征服六国 统一华夏	(10)
“天时与人谋”是统一制胜的基本	(17)
锐意改革 加强中央集权	(19)
焚书坑儒 施暴于民	(24)
嬴政功过的评说	(27)



汉高祖刘邦

(公元前 256 或前
247—前 195 年)

汉高祖刘邦	(30)
秦末农民起义与楚汉之争	(31)
霸王别姬 刘邦称帝	(33)
治国理政 顺应民心	(37)
经济大发展 商贸创新篇	(39)
把汉高祖开创的事业推向高峰	(41)
西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地位	(44)

1

目
录





汉光武帝刘秀

(公元前6—公元57年)

汉光武帝刘秀	(47)
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	(48)
王莽篡汉改制及其失败	(49)
乘乱兴兵 克定天下	(52)
重建汉朝 “柔道治国”	(57)
勤俭理政 广纳贤士	(60)

魏武帝曹操

(公元155—220年)

魏武帝曹操	(63)
少怀壮志 以屈求伸	(64)
讨伐董卓 平定兖州	(67)
挟天子以令诸侯	(70)
南征北战 克定天下	(74)
唯才是举 善于用人	(79)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83)
千秋功罪 任人评说	(87)

蜀汉开国

皇帝刘备

(公元161—223年)

蜀汉开国皇帝刘备	(91)
东汉末年的混乱政局	(92)
豪强纷争 趁乱崛起	(95)
三顾茅庐 隆中对策	(97)
赤壁之战与魏蜀吴三国鼎立	(102)
底定巴蜀 汉中称王	(109)
荆州相争 伐吴败北	(113)
刘备白帝城临终托孤	(116)

晋武帝司马炎

(公元236—290年)

和他开创的

晋代王朝

司马炎和他开创的晋代王朝	(119)
称帝前后的政治形势	(120)
治国安民的重要举措	(123)
大兴分封制度 统治集团日渐腐朽堕落	(124)
八王之乱与东晋十六国	(128)
晋代科技文化的新发展	(132)



隋文帝杨坚 (公元 541—604 年)	隋朝开国皇帝杨坚 (136) 称帝前中国的政局 (137) 韬光养晦 志在夺权 (140) 知人善任 赏罚严明 (143) 励精图治 利国惠民 (146) 奢侈狂暴的隋炀帝 (151) 官逼民反 隋朝灭亡 (156)
唐太宗李世民 (公元 599—649 年) 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与“贞观之治” (158) 隋末农民起义中乘时而起 (159) 夺关斩将 屡立战功 (162) “玄武门之变”与唐高祖让位 (165)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168) “民为邦本” “静为农本” (171) 任人唯贤 虚心纳谏 (174) 开创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新纪元 (176)
宋太祖赵匡胤 (公元 927—976 年)	宋太祖赵匡胤 (179) 唐末“五代十国”之纷争与割据 (179) 陈桥驿兵变 (181) 建立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 (183) 对辽夏“怀柔政策”的反思 (184) 经济复苏与“三大发明” (186)
元太祖铁木真 (公元 1162—1227 年)	元太祖铁木真 (190) 艰辛备尝的童年 (191) 大汗崛起 霸业千秋 (194) 弯弓射大雕——征伐夏金 (196) 远征花剌子模 横扫西亚东欧 (200) 统一中国的艰难历程 (203) 千秋功过任人评说 (206)



明太祖朱元璋

(公元 1328—1398
年)

- 明太祖朱元璋 (210)
苦难的童年 (211)
投身“红巾军” 叱咤风云 (213)
南征北伐 夺取全国政权 (216)
登基做皇帝 创建大明王朝 (219)
励精图治 全力恢复发展生产 (220)
加强中央集权 严惩贪污腐败 (224)
工商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 (227)
综合国力的增强与郑和下西洋 (230)
极端君主专制的腐败与明末的社会危机 (232)
历史对朱元璋的评说 (235)

清太祖

努尔哈赤

(公元 1559—1626
年)

和他开创的

大清王朝

- 清太祖努尔哈赤和他开创的大清王朝 (238)
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 (239)
定都北京 夺取全国政权 (242)
郑成功收复台湾 (245)
大清王朝的黄金时期——康雍乾时代 (247)
匡正吏风 表彰廉吏 惩治贪官 (252)
康熙皇帝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255)
盛世悲歌 落后就要挨打 (258)
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265)

秦朝建立者嬴政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是秦庄襄王之子。年13岁庄襄王死，他被立为秦王。时吕不韦为相，宣太后嬖臣嫪毐受封长信侯，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亲理朝政，嫪毐趁他外出之机发动叛乱，秦王一举粉碎吕不韦——嫪毐集团，杀嫪毐，幽禁太后。次年免吕不韦相，旋采纳李斯等灭六国、成一统之计。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始，至公元前221年灭齐，10年间悉灭六国，结束了180多年战国混乱纷争的局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并相应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既是一代英主，又是一位“焚书坑儒”的暴君，既有大功，又有大过的历史人物。



提起秦始皇，马上在世人面前，就会出现一个专制独裁皇帝的影像。其实，这位在西方人眼里被称做“中国拿破仑”的始皇帝，却是一位饱经世态炎凉的奇特男人。8岁之前，母子二人被父亲丢弃在到处充满仇恨目





光的敌对国家，过着宛如“弃子”般的生活。幼小的秦始皇承受着终生难以泯灭的心灵伤害，强烈的报复心使秦始皇对权力产生了奇特的嗜好。

秦始皇在极为特殊的环境中成长着。刚满13岁就继承了秦国的王位，然而，此时丞相吕不韦，就像一棵百年老树，盘根错节，深入秦国的各个阶层，官商网络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吕不韦不除，秦始皇的独治权便无法贯彻。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的秦始皇，在清除掉吕不韦之后，便不失时机的发兵灭韩，拉开了10年统一战争的序幕。在腥风血雨的残酷战争中，以超乎常人的气魄，果断的胆识和铁一般的手腕，先后消灭了诸侯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为后世中国的巩固、发展、完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进而在发展经济和社会文明方面作出世界性贡献，奠定了基础。

嬴政生活的战国时代

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史称“春秋”时代；此后，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史称“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的五个半世纪，是中国古代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代。从政治上讲，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代替了授民授土的封邑管理体制；从贵族专权、“世卿世禄”过渡到以任免为特征的官僚体制。从经济上讲，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代替奴隶主贵族多级占有的“井田制”；从“工商食官”过渡到私人工商业比较自由发展，并空前繁荣的局面。而涵盖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内容、遍及战国各国的变法运动，是一场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封建化运动，变法的成功标志着封建制度的确立。

伴随政治经济变革的是列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兼并战争，它使数以百计的大小诸侯国并入几个封建大国，从而实现了区域性的统一。剧烈的政治经济变革，残酷的战争，文化的积累，促成了思想领域“百家争鸣”思潮的勃兴。而所有这一切，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统一的中华民族的雏形——华夏族已经出现。

春秋战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宗族奴隶制为特征，以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以井田制即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国奴隶社会，以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绵延了夏、商、周三个朝代，近2000年之久。这个时期，青铜工艺尽管达到了

世界最高水平，但由于青铜是稀有金属，奴隶主多用于制造礼器、武器和生活用品，却很少用来制造生产工具。因此，当时的生产工具主要还是木器、石器、骨器和蚌器。历史进入战国时代，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社会获得了变革生产关系的崭新力量。

到了战国中期以后，公元前475—前221年，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更加普遍。从东海之滨到川陕地区，从松辽平原到江淮的广阔沃野，几乎到处都有战国时期的铁器出土。河南辉县的魏墓出土有犁铧、䦆、锄、镰、斧，湖南长沙的楚墓，河北燕国遗址，都发现了铁农具和制造这些农具的铁范。在河北石家庄市一个赵国墓出土的生产工具中，铁制工具占65%。辽宁抚顺燕国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占全部出土农具的90%以上。这说明经过春秋战国500年左右的发展，铁制工具在社会生产中已经占了主导地位。

与铁制工具使用和推广差不多同时，牛耕也开始广泛使用，给农业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大规模的开垦和精耕细作同时并进，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许多草莽丛生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肥田沃野。铁器还为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建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吴国开凿了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渠，成为后世南北大运河的奠基工程。魏国邺令西门豹“引漳水灌邺”，把大片盐碱地改造成良田。秦国的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筑了都江堰，使万顷土地得到自流灌溉，成都平原从此成为“天府之国”。战国末期的秦国，在关中地区修建了著名的郑国渠，使4万顷土地得到灌溉，为秦国后来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物质基础。铁的应用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掌握生产季节和气候的“审时”，粗分土壤种类的“辨土”，以及精耕施肥的技术都得到了应用。

铁的广泛应用，在为手工业提供大量工具的同时，还提供了远比青铜更丰富的原料。尤其战国时期，随着冶铁和锻造技术的不断提高，特别是钢的出现，钢铁已被用到制造农具、手工业工具、兵器和社会生活用品的方方面面了。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发达起来，货币经济也渐渐抬头。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影响下，不少地区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都会，如咸阳、洛阳、邯郸、南阳、临淄、寿春等。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在生产关系方面，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城市经济都出现了空前繁荣发展的局面。到战国时期，全国就形成了各具特色、彼



此联系的东西南北中五大经济区：

——东方为齐鲁经济区，区域为今之山东全境和河北南部，以齐国为主，盛产鱼盐钢铁麻桑、工商业发达，号称“冠带衣履天下”。

——南方经济区包括淮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广大地区，即原来的楚、吴、越三国。这里地广人稀，河湖纵横，资源富饶，商贸发达，农业稍显滞后。

——西方经济区包括关中、巴蜀和西北地区，为周、秦故地，有较发达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商业。

——北方经济区包括燕国、赵国北部和中山地区。其北部、西北部、东北部与游牧民族接壤，牧业发达，农业相对粗放。

——中原经济区指黄河中游地区，包括赵国南部、韩、魏、宋、卫等国。这里是夏、商、周三代的中心区域，有发达的农业与活跃的商贸。

由于五大经济区各有特点，物产不同，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间此疆彼界，关卡林立，但因为各地百姓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商人们还是在利益的驱动下，突破关卡，将各地的土特产品贩运到紧缺地区，促进不同地区的物资交流。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和成长，造成和扩大了各诸侯国之间力量的不平衡，从而出现了列国争霸和兼并战争。连年不断的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大量积蓄的粮食，毁于战火；无数的社会财富，耗于刀兵；数以百万计的青壮年男子，战死疆场。“易子而食，析骨而炊”（见《左传·宣公十五年》），百姓为这个战争付出的是大量的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然而，恰恰是这样连年累月的战争，既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也加快了统一的步伐。

争霸和兼并战争，以优胜劣败的铁的规律，使锐意革新的国家，封建生产关系迅速成长，日臻强大。也使一些弱小落后、固守奴隶制旧垒的国家日趋没落，最后走向灭亡。然而，战国后期中国统一的形势已经形成，战国七雄中也不乏觊觎统一果实的雄主，但最后摘取这一硕果的却是六世坚持改革百余年不变的秦国和它的国君嬴政。

商鞅变法 富国强兵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比较落后。到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立，在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受着中原地区各国进步的社会